

#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与新兴大国参与——基于“非纯公共物品”概念的分析

刘毅

**【摘要】** 现有关于国际公共物品的论述过度关注“公益”性质，相对忽视国家特别是核心国家作为供给主体的主动地位及其战略考量。事实上，核心国家在提供各种国际公共物品时已经考虑到他国“搭便车”的可能性，纳入对外供给与消费模式设计。中国关于“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的提法可以视为此类战略动向的最新回应。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原有理论，理解“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非纯公共物品”角度出发讨论国际公共物品的推动因素以及运作机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该明确战略重点，注重“供给”与“营销”相互配合，创设或创新具体形式，提高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与精致程度。

**【关键词】** 核心国家；搭便车；非纯公共物品；新兴大国

**【作者简介】** 刘毅，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国际关系学博士

##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The Role of Emerging Power: 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Impure Public Goods

By Liu Yi

**【Abstract】** The existing analysis of global public goods over-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Great power as a main provider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se strategic initiatives, which may be ignored. In fact, main power has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le free-riders when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nd making its foreign strategic plan. China's announcement to "welcome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o be a free-rider and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 and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free-riding phenomenon. The concept of impure public goods may be useful and effective when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global public goods are being provided and are relatively efficient. As

---

an emerging power, China should have a clear strategy on global public goods with a possible “marketing” viewpoint, including more initiativ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so that the glob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ay be more diverse and well-planned.

**【Key Words】** Main Power, Free-Riding, Impure Public Goods, Emerging Power.

**【Author】**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UIR

## 一 搭便车质疑与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国际公共物品”与“搭便车”的争论属于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全球化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热点问题体现出国际公共性质,例如建立合作机制、维护自由贸易、开展对外援助、修复全球生态、应对金融危机、保证区域和平、打击跨国犯罪等,使相关概念不断升温。传统理解中有关公共物品“非排他性”(non-exclusive)、“非竞争性”(non-rival)特点被简单推广至国际层面:由于缺乏国际强制力量,各国更倾向于“搭便车”而非主动提供公共物品,导致“供给困境”。“搭便车”由此成为很多政治家、外交实践者的日常语汇。201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专访时,指出中国确实是在“搭便车”：“他们搭了30年便车了,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sup>①</sup>又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访问蒙古国并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愿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前来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sup>②</sup>

实际上,习主席关于“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的提法,确实反映出国际社会一种新动向,在战略援助、经济合作、区域安全等诸多领域,核心国家正在有意容许特定国家以特定形式“搭便车”,并将其视为积聚“人气”、提升信誉的有效路径。“搭便车”本身则作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必要构成部分。在国内公共品讨论中,关于如何开展营销、促进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或市场竞争供给),已有大量论述。<sup>③</sup>国际层面的公共物品供给行为与国家间合作战略的相互作用、多中心供给的激励机制、具体供给形态差异等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讨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霸权国(也包括核心国家)为何允许此类“搭便车”行为?相关的问题包括:核心国家自身是否也作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消费国”?其他国家的支持、配合与消费行为是否构成国际公共物品存续的必要条件?就当前情况而言,以国际公共物品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现象仍大量存在,原有供

<sup>①</sup> <http://www.nytimes.com/2014/08/09/opinion/president-obama-thomas-friedman-iraq-and-world-affairs.html>.

<sup>②</sup> 习近平. 守望相助, 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 新华社乌兰巴托2014年8月22日电.

<sup>③</sup> Todd Sandler. Donor Mechanisms for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J]. World Economy, 2005(8).

给国仍在持续提供国际公共品，新兴大国也在谋求成为更“专业”的供给者。有理由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战略收益考量，而非理想主义。因此，仅依据“搭便车”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简单逻辑，或将其归于供给国的“善意”、“仁慈”，很难解决此项疑惑。

国际公共物品议题对新兴大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含义与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过渡状态”，从主要由外部激励推动、在关涉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领域内作为“聪明的搭便车者”转向更积极主动、关涉全球利益的负责任大国。

<sup>①</sup>这一认识隐含有弥补“责任赤字”甚至自我指摘之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中美共治”的讨论一度相当热烈，已经出现各种有关“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设想。<sup>②</sup>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正面回应“资源掠夺”、长期“搭便车”指责，通过大规模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国际公共物品，以求改善国际形象、提升软实力。对此，更加谨慎的意见认为，在霸权国既有硬实力与软实力范围内不加选择地提供公共物品，只能是徒劳无功，不能改变他对霸权的“关系资产专用性”。针对这些现实议题的理解，首先应该澄清概念，明确国际公共物品的类型、供给动机、运作机制，进而探索中国特色的供给思路。

## 二 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追溯

围绕公共物品的早期争论多见于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概念由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54年首先提出。萨缪尔森区分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认为后者具有如下特点：每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均不会导致其他人对此物品消费的减少，难以排除不付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sup>③</sup>此后有关讨论基本围绕国内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展开，得出以“非竞争”、“非排他”为本质属性的解释框架。以此为基准，公共物品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迅速推广。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化研究者、环境论者、发展论者、国际组织与公民社会研究者对国际公共物品概念展开深入探讨，他们的思考视角更多是导向“公益”

<sup>①</sup>蔡拓.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思考[J]. 国际政治研究, 2012(4).

<sup>②</sup>金中夏.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探讨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6).

<sup>③</sup>Paul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11).

而非“政治”，而有别于奥尔森（Mancur Olson）、拉塞特（Bruce Russett）、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基欧汉（Robert Keohane）、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论者。<sup>①</sup>目前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定义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世界银行给出。前者强调全球公共物品的时空延展性，标准包括：（1）其益处有“强烈的公共特性”，消费时非竞争、非排他；（2）其益处对所有国家、人民、世代有基本的普遍性，受益者包括整个人类。<sup>②</sup>世界银行的定义强调国际集体协作，将全球公共物品认定为“具有实际跨国外部性的物品、资源、服务、规则系统或政策体制，对发展和减少贫困非常重要，只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合作与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给。”

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全球产品几乎完全属于公益性质（如灾难救援、疫苗研制、统一度量单位等），它们多数是由联合国体系以及各类国际组织负责运作，其“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点相对突出。但是显然还有为数众多的国际公共物品不能完全归入此类相对狭窄的定义，它们确切而言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类似于布坎南分类中的“俱乐部物品”（排他非竞争）或“共用资源”（竞争非排他）。这类“非纯公共物品”（impure public goods）构成当前主流的供给类型，具有关键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般认为，国际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难题”是指：在缺乏国际强制力的环境中，基于公共物品非排他、非竞争特点，每个国家都清楚（并且知道他国也清楚）即使不付出代价（或付出较少代价），同样可以消费这些物品。为此，各国可能选项是：完全不付出成本或是单独承担全部成本。导致供给国缺乏积极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难以实现其公益目标。<sup>③</sup>

但是，对国际公共物品“公益”性质的过度强调以及“供给不足”现象的心理定势，很可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今大部分具有关键意义的国际公共物品处于“基本足够”或相对稳定的供给状态。它意味着各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改进供给现状，即“向上均衡”，而非相反方向。之所以没有变得“更好”，可能是受限于国际供需关系（例如需求度尚未升级）。即使公益导向的“纯粹公共物

<sup>①</sup> Marco Ferroni.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centives, Measurement and Financing[M]. World Bank. 2002.

<sup>②</sup> Inge Kaul.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③</sup> John Conybeare. Public Goods, Prisoners Dilemmas and IPE[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4(1).

品”出现一些供给不足或暂时短缺的现象，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为此，有必要超越国际公共物品的最小定义，全面理解相关概念。<sup>①</sup>

在一般意义上，公共物品的公益性意味着：此项经济活动对外施放有益影响，而未获得绝对等值报偿。就这一点而言，产品消费的公益性质与私人性质之间，边界并不清晰；很多私人物品本身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公益性（共同消费），也可能产生正向外部性的外溢，实际的区别只在于公益程度大小。而且，产品公益性的确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公益性”本身属于外部力量基于各种原因（主观或客观考虑）所作的一种“矫正”，意味着私人物品的“公物化”。同等矫正力度下，公益强度的差别取决于物品的私人性质；公益强度等同则矫正力度不同。象征收费（体验营销）、错时交换（短期内不对等）等一系列行为，都有可能导致私人物品客观上具有某些公益性质（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

在相反方向上，公共物品也存在“私物化”可能性。资源稀缺是产品经济属性的总前提，所有物品应该都具有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竞争性。这表明，公共物品不等于免费产品，或者说不存在免费产品，只存在“交换给付”、“跨期付费”问题。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兼有公益性质（吸引他国参与，维持客户群体）和公害性质（维持自身收益结构稳定性）。其他国家可以自由“搭便车”，但不能自由“脱身”，否则代价极大（例如，国际货币制度便于各国储蓄财富、开展交易，但这些国家也必须承担发行国货币政策可能的风险，类似于人质）。可见，增加消费而边际成本不变的情况是有限度的，相较于“纯公共物品”而言，“非纯公共物品”更具有典型意义。

不同于私人物品相对清晰的权属状态，非纯公共物品的特质在于其消费权属的开放界定与调适状态。<sup>②</sup>事实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排他”，技术进步与具体安排总是能够排除一部分国家的消费资格，问题只在于这些技术或安排是否有用，能否实现供给国战略意图。真正纯粹的国际公共物品只能设定为一种理想化状态（排他成本过高），现实中绝大部分国际公共物品都可以归于“非纯公共物品”范畴。可以看出：非纯公共物品位于“纯公共物品”与“私益物品”之间，接近前者（公益方向）可以吸引他国消费，接近私益方向则有利于回收成本并保证收益。之前对于竞争非排他、排他非竞争类型的准公共物品，缺乏相对统一的

<sup>①</sup>Inge Kaul.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②</sup>陈其林. 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定义、分类依据及其类别[J]. 经济学家, 2010(7).

整合解释,对其内在机制也缺乏深入探讨。关键问题是,以往研究倾向于将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截然区分或将其归于同一类型,都不利于解释其供给状态的差异。本研究将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视为一种连续的概念谱系,基于公益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国家私益物品”、“非纯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其中,“非纯公共物品”位于连续谱的中段,根据供给国具体战略需要,可以适时调整合作门槛与“优惠程度”,基于“竞争非排他”或“排他非竞争”的消费特点,展开模糊交换,实现较高级别的多元化供给,有别于其他两种基本类型。

### 三 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形态

一般而言,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存在的问题至少包括:(1)供给不足。某些“纯公共物品”可能出现资源告急、影响基本消费的情形;(2)供给失调。公共物品的供给处于调整过程,尚未形成基本供需均衡;(3)供给过度。更接近“私物化”的公共物品容易出现供给积极性过高情形。例如集团化军备竞赛、区域合作的重叠制度框架等。<sup>①</sup>这一方面能够证实:“非纯公益化”的公共物品具有可能性;供给国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就会产生相应的供给动力。另一方面表明,非纯公共物品的供给国可能具有较强的“私物化”冲动。

既然私益物品收益更明确、供给积极性最高,它能否取代“非纯公共物品”甚至全部的国际公共物品?在现实中,这一问题似应表述为:非纯公共物品为什么没有转为私益物品(即核心国家为何允许搭便车)?在国内公共物品领域,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强制规定一些重要的公共物品不得完全交由市场供给;在国际公共物品领域,这一理由并不充分。供给国可能基于道义、合法性或威望的需要,无偿提供某些“纯公共物品”。但是,重要的非纯公共物品供给仍然取决于供给国利益取向,而非公共物品本身的公益性质。之所以没有全部转变为私益物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存在诸多困难,许多利益只能从外部获得,或者通过公共物品与私益物品的“议题联系”(issue linkage)才能生效。因此,只有体现出某些公共物品性质(例如模糊化交换以及战略让利行为等),才能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合作,保持其“规模效应”。这意味着“俱乐部化”可能

<sup>①</sup> 李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J]. 当代亚太, 2011(4).

存在某些限度,难以持续推进。如坚持绕开其他大国或关键国家,将会给本国(或者俱乐部)带来更多损失。世界贸易组织(WTO)最终将中国与俄罗斯纳为成员国,即是一例。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理解,稳定的国际体系有赖于霸权国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例如安全秩序、经济福利、制度规则等),并容许一定程度的“搭便车”。<sup>①</sup>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开放自由的贸易体制、稳定的货币体系、大规模国际援助等关键公共物品的供给,确实由美国承担或主导。为遏制苏联,美国长期容许西欧、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国家“搭便车”。另一方面,霸权稳定论发现,霸权治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并有可能超过边际收益;相对“衰落”的霸权国将面临“增加资源”、“减少成本”两种可能的思路。<sup>②</sup>后一种选择更常见,致使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进而影响到全球秩序。冷战后,美国提供“全球公益”的意愿被认为相对下降。奈(Joseph Nye)指出,“在经济以及跨国层次,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sup>③</sup>根据奈的归纳,主要的全球公益包括:区域均势、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公地共享、国际制度规则效力、经济发展援助、冲突调解等。美国在这些领域确实出现一些偏向性、选择性意向,但总体上并未出现明显的“供给断崖”。

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事实上,吉尔平曾经明确指出,“霸权稳定论”并非决定论,而是带有条件性。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而言,霸权是必要的(necessary),但不是充分条件(not sufficient)。<sup>④</sup>这表明,霸权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中断或终止。基欧汉基于制度主义立场,认为在霸权之后维持相对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权力的总体分布与具体领域内的国际机制并不完全重合,总体权力变动与“问题领域”的权力生态也存在不一致性。<sup>⑤</sup>这实际上表明,国际公共物品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有可能实现多元化、多领域分别供给。

但是,霸权稳定论相关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预设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是霸权国家基于“道德”、“良心”、“善意”而施惠于全世界的一种“福利”。这与前

<sup>①</sup>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up>②</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③</sup> Joseph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2).

<sup>④</sup>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⑤</sup>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述关于全球公共物品研究的“公益偏向”相呼应，并且符合一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正确”。但它并非问题的全部。通过提供带有某些“非中性”的国际公共物品，美国真正获得了丰富、可持续的全球收益，这些收益分布在国际政治、安全、经济、规则、意识形态、世界领导权等多个层面。利用霸权地位率先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优势在于：提前布局、形成先动优势；设定进入标准、确立“制度霸权”；全面主导公共物品供给的“收益结构”。目前这一局面仍在延续，而未结束，其重要原因在于：对美国而言，重要公共物品早期供给的“高成本、低收益”阶段已经基本过去，当前总体收益相对稳定，只需维持、微调或改进供给战略，而非自我颠覆。由此基本未出现国际公共物品大规模“私物化”情形。

冷战结束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趋势明显，客观上导致霸权国公共物品份额相对减少，垄断局面被打破。目前主要形式包括：双边合作供给、国家集体供给、国际组织供给等。其中，双边战略合作（例如各类战略援助）阻力较小，容易取得实质进展，成为“非纯公共物品”的典型案列。各国联合提供的“俱乐部公共物品”之中，核心国家与其他参与国之间存在各种利益交换与偏好协调机制，维持自身收益与集体收益的均衡；广义的国际组织不仅包括各类实体，也包括国际规范与制度的多层次网络构架，它们是各种纯公共物品主要供给者，同时也具有隐性或显性的非纯化含义，反映创设国或主导国利益偏好的非中性。

多元化供给局面反映出当前全球议题领域的复杂化、模糊化趋势，特别是国际社会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延展。这种需求不仅来自“消费国”，同样也来自供给国，并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当前，主要大国都在尝试提供一些能力所及的“非纯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霸权国垄断供给的局面。

#### 四 国际公共物品的营销逻辑

非纯公共物品的公益性质，主要源于其“权属开放化”、“非均质消费”等特点，本质上属于一种短期内不对等的交换行为。一般而言，它首先有利于消费国（搭便车），次后再逐渐有利于双方特别是供给国。此类不对等利益分布的“再调整”具有延时性质。已有学者注意到此类合作的“层叠性”与“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作用。<sup>①</sup>这一过程的重要条件在于:各国拥有利益与资源的差异,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收益函数与成本敏感程度的区别。相对而言,主要大国都存在某种“消费收益高、成本敏感度低”的特点。即使是在初始阶段,这些大国就有可能率先获得净收益(或收益增长率显著超过成本);对消费国而言,“搭便车”过程可能改变其收益函数的位置与“形状”,促使更多国家先后加入,形成必要的合作规模。

国家围绕“非纯公共物品”展开不对称交换行为,属于一种共时意义上的策略互动。它意味着行为体的选择经常需要考虑它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及反应,由此调整预期信念。当然,在理性解释框架内,行为本身仍是目标导向的,行为体试图寻求实现最优或更好的结果。但是,考虑到其他行为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目标偏好(不一致性),互动过程中的行为可预测程度是有限的。因此,行为者收益不仅取决于自身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与策略,与多数行为者的决定及其动态强化过程有关。

在历时意义上,跨期因素是“非纯公共物品”可实现性的关键。它意味着对战略价值的延时回收。本质上,国家行为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不存在一种绝对非理性的选择;选择本身也可能导致战略价值变动,亦即跨期交换是一种相对理性,只能获得相对满意的结果。因此,国家行为体对收益总量的认知并不清晰,边际收益与“总量收益”的联系也不是特别紧密。策略互动类似于一种“投资”(在长期、当期、心理效用基础上考虑折现问题)。作为一种以短期趋近长期的“战略包络”,围绕非纯公共物品的交换行为具有理论可行性。<sup>②</sup>这也是搭便车(消费)行为的理论基础。

非纯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均质性。在既定条件下,不同国家对该物品的需求层次不同,消费数量或消费品质并不均等。与之相对应,“纯公共物品”消费国偏好差异相对较小,各国受益更平均,公益度高于“非纯公共物品”。对后者而言,由于消费需求层次(弹性)较高,消费国支付意愿更强,物品本身的意义更突出,扩大了市场化、多元化供给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具有双向含义,可能出现消费不足与消费过度情形。这里,竞争非排他(共用资源)、排他非竞争(俱乐

<sup>①</sup> 庞珣. 国际公共物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7).

<sup>②</sup> David Lake.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部物品)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结,共同作为非纯公共品动态调节支点。

在消费不足的情形下,非纯公共物品供给国可能采取“质优价廉”的思路,增强公共物品的“公益性”或开放性(降低排他性),通过更多让利行为或“体验营销”方式,保证客户国数量。这样接近于“竞争而非排他”的“拥挤型物品”(共用资源)。<sup>①</sup>此类“拥挤”属于非价格竞争的结果,甚至可能带有策略含义。如果消费国认为当前的非纯公共物品在分配结构、价格区间、急需程度等方面尚属适宜,就会在调整成本方面做出适当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供给国家的适度权力和利益效应,进而形成某种“不对称依赖”。这种“搭便车”行为具有当期的投入代价以及长期的机会成本。此时,公共物品的供给国本身也作为搭便车过程的共同“依赖者”。

在消费国纷纷选择更好的“非纯公共物品”情况下,有可能形成某种垄断趋势。此时,供给国有可能增强公共物品的“私益性”(强化排他性或竞争性),通过提高门槛(升级消费档次、适度减少数量、搭售私益物品)或“饥渴营销”等方式制造稀缺,增加本国收益。例如,“俱乐部物品”具有较强的私益倾向:通过设定消费门槛,排除零贡献国家,从而呈现更明确的非纯化特征。然而,这种“抬高价格”的选项具有某种限度。一旦形成某种动态均衡,消费国与其他供给国的竞争选择将迫使原有供给国再次进行调整。因此,较优策略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收益结构,使较多的消费国相对满意,适当改进“非纯公共物品”的质量与效能,节约成本,从而形成较优状态均衡。

## 五 国际公共物品的中国思路

非纯公共物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霸权国长期允许搭便车行为。这一概念有助于澄清以往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公益性与私益性的理解偏误,获知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根源,在理论层面回应“搭便车”指摘,明确相应行为动机。对于新兴大国而言,确有必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确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战略重点和优势方向,从战略层面对供给过程进行规划、组织与协调,强调资源(能力)的优化与集中运用。需要考虑如何创新既有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形式,

<sup>①</sup> David Kapur, The Common Pool Dilemma of Global Public Goods[J], World Development, 2002(3).

注意节约原则，节省供给成本，提高精致化程度。

其一，中国需要在增加国际公共物品投入，同时明确战略重点。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应该视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必要投资与必需成本。这一过程有利于本国获得稳定的国际支持、巩固国际民意基础、赢取战略合作机会、改善形象、增强关系亲和力，进而扩展全球影响力与利益空间等。<sup>①</sup>这些收益很难通过简单对等的契约交易方式获得，必须做出某些让利行为，才能得到战略回馈。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强化投入。应该考虑将资源投入重点集中于“非纯公共物品”，积极参与供给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争取必要的市场份额与客户国群体。

其二，中国需要开拓“非纯公共物品”的视野范围，适应国际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新要求。不宜将国际公共产品仅仅理解为会费、捐赠、资源、设施、合同，它们可以是制度、行动、劳务、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经验等；可以体现为政府牵头，社会承接的供给运作方式，甚至可以设计成金融产品与投资基金；可以适时考虑制定区域层次乃至全球范围的规则与制度，创设可行的区域合作机制与金融组织，作为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可能思路。中国可以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提供保障方案与合作平台；在高端外交领域设立各类专员、特使、特别代表，发挥善交朋友、耐心细致的斡旋优势；开展能源供应合作、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协助治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污染、保护极地生态；在更多区域开展农业示范项目、技术合作项目、专业培养项目；为重债穷国减免债务、提供可行的开发方案；等等，使国际社会以及重要关系国真正体会到新兴大国带来的好处。<sup>②</sup>

其三，可以通过“供给”与“营销”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战略型公共物品供给。应关注区域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等灵活多样、易于操作、可进可退、急切而有针对性的形式，注重基本的战略收益（而非完全公益）。基于“非纯公共物品”的营销逻辑，有必要适时增强可能的“讨价还价资本”，突破简单的交易状态，克服某些短时利益诱惑，赢取核心关系的可持续性。在若干具体问题领域，需要评估其消费状况（不足或过度）及发展态势（垄断强度），确定投入方案（以及是否搭便车），而不宜一味给予无效投入。总之，“非纯公共物品”作为可能选项，将有利于新兴大国适度突破既有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垄断状态，在更广泛领域内确立优势地位。

<sup>①</sup>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sup>②</sup>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